

“有一种叫 **云南** 的生活”

传承多彩历史文化 畅享文山美好生活

兰天明 王成跃



文山美好生活图景。本报记者 胡好雅 摄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接壤,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界,西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北与曲靖市相连,自古就是我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通道之一,享有“交趾古道”“滇桂走廊”之美誉。

文山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早在五万年前就有晚期智人“西畴人”在此繁衍生息,广南县一带更是与古滇国、夜郎国齐名的句町古国都城所在,不仅诞生了灿烂的句町文化,更有壮族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交融共生,成为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文山人杰地灵,这片土地浸润了深厚的红色基因、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著名学者楚图南、“狂飙诗人”柯仲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王有德的故乡,孕育了文山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老山精神”“西畴精神”;文山物产丰富,是“南国神草”三七的原产地,催生了独特的食药同源民族饮食文化,成为休闲康养的时代新宠。在文山这片神奇美丽的红土地上,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生动诠释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好在文山”。

探秘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不外乎考古发现和史料佐证。《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广南府志》记载,汉昭帝始元年(公元前83年),汉朝封句町部族首领毋波为句町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在句町王封王以前,在西南民族中,受封王者有夜郎王和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句町”与“滇”为同时期的部族,也是汉王朝在云南继封“滇王”之后的第二个王。句町国作为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主要方国,在西南夷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2007年至2016年近十年间,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县

文物管理所,对位于文山州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白龙坡的汉代古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封土堆墓5座、小型墓葬2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诸多文物,其中包括铜鼓、龙虎纹金腰扣等一大批重要器物。2019年10月7日,牡宜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现及史料记载,足以证明以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坝区为中心约5平方公里的牡宜遗址,正是汉代句町王族的活动遗存,证实了牡宜坝区就是句町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句町古国的千年兴衰,句町王毋波的封王故事,除散见于《后汉书》《三国

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史料外,主要记载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该书记载: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句町国内附大汉王朝,汉武帝在其地置“句町县”。公元前81年句町侯毋波因助汉平叛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有功,被汉昭帝封为“句町王”。成帝和平年间(公元前28—25年),西汉朝廷派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后,句町王禹、漏卧候俞“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句町国日益壮大,控制了益州郡及牂牁郡的广大地区,成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最强的王国。从公元前81年汉昭帝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国一直延续到公元502年萧齐时期被梁朝取代,历时达583年,若从公元前111年句町国附汉算起,则有613年。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岁月的尘埃落定,历史的故事渐行渐远,但文化的传承却从未间断。“句町”这个古老王国,不仅是秦汉以来“大一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生动范例,同时也见证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如今,走进文山的村村寨寨,很多村寨还保留有供奉毋波的土主庙,通过挖掘句町古国在青铜文化、稻耕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文化遗产,将句町古国文化品牌打造为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以及民族特色展示于一体的文化品牌,凝聚起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力量。

“南国神草”耀百年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云南江川伤科名医曲焕章研制出百宝丹,这就是后来享誉海外、畅销东南亚的云南白药,据传曲焕章之所以研制出百宝丹,得力于山上采药时无意间发现的一味伤科奇效草药——三七。三七,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名贵珍稀药材,因“七叶三枝”而得名三七,为传统统治跌打损伤的主要药材,明代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

“筑实者山,辉光者文”,被誉为世界桃源的文山不仅历史文化悠久,还拥有独特宜人的自然环境,集海拔相

对高、纬度相对低、降雨相对多“三个相对”特点于一身,独有的地理环境、土壤和气候条件为三七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文山是三七的故乡、主产区,是世界公认的三七道地药材产区,文山州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三七种植历史至今已有400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三七之乡”。

据了解,三七已有近千年的使用历史,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三七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

味同而功亦等,故称人参三七,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三七的珍贵及奇特疗效由此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被誉为“南国神草”。

好山出好水,好水育一方。三七茎、叶、花均可入药,为中国最早的药食同源植物之一,被国家卫健委列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同时也造就了文山以三七为主体的食药同源民族饮食文化。文山食药两用的代表菜肴以三七气锅鸡最为有名,被誉为“十大滇菜”之首。据传三七气锅鸡为清代乾隆年间临安府福德居厨

师杨泗发明,菜肴以三七、土鸡为主料,以“气锅”这一“蒸、煮、炖”三法合一的烹饪方法进行烹饪,不仅美味可口,老少皆宜,而且将三七补血、补气的功效发挥到极致。生长于这片沃土上的三七,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的不断开发培育下,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品质优异,已然成为文山的耀目之星。“春天食花、夏天食菌、秋天食果、冬天食七”的食药同源民族饮食文化,成为“好在文山”的地理名片,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养心、养眼、养肺、养生”。

人文风采通古今

文山“一州连两国四省”,历史上的“交趾古道”从四川南下,经文山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今天的“滇桂走廊”由文山向东西两端延伸,“交趾古道”与“滇桂走廊”在不同的时空交会。

文山历史演变建立在优越的地理条件之上,在秦汉时期,文山便有“交趾古道”之美誉,是蜀地经僰道、滇池向南,从句町、进桑人交趾(今越南),达于南海的必经之地。在与越南接界长达438公里的国境线上,边境进出口贸易日趋繁荣,自然风景可

观,民族风情文化多姿多彩。11个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节日文化和风俗,壮族“三月三”、苗族“踩花山”、彝族“花脸节”、瑶族“盘王节”等,一个节日一个传说,一个传说一个向往,各族人民互通互融,在文山这片热土上共建美好家园。

文山境内多为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走进文山,仿佛走进一处处桃源,水是这里的灵魂,山在水里、水在山中、山水相拥;喀斯特岩溶遍布、峰丛林立,河

道蜿蜒组成了文山钟灵毓秀的风景。《诗经》中有“隰有荷华”之句,文山普者黑喀斯特绿洲就是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水世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水文环境,孕育了该地域生物多样性和特有性,可以泛舟湖上,在夏日的荷塘上做一次采莲女;或恍若身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沉浸于坝美田园山色中,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丘北普者黑的渔舟唱晚,广南坝美的世外桃源,还有广南八宝的田园综合体风光以及文山薄竹山的云海日出,柳

井溶洞群的地底洞天……丰厚的人文资源,是文山各族人民对共享美好生活的心意。

自然的馈赠根植于文山的奇山秀水之间,世居于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信守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则,以自身的勤劳淳朴,成就了仿若世界外的一方绝域、一处仙境。而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文山,通过不断挖掘地域文化,打造优势产业也正在从这片古老土地亘古的智慧中萌发出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共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

一个意思,形容杨梅看着就像是一颗颗鲜红圆润的宝珠。

再论杨梅的滋味,因其甜中带酸,与葡萄、荔枝颇有相似之处,所以诗人们也都习惯于将二者和杨梅相比,如之前提到的诗人释祖可就对杨梅的味道赞不绝口,认为其“味方河朔葡萄重”“河朔的葡萄固然美味,但相较于起来,杨梅在口感和耐贮上要更胜一筹;他甚至还搬出同样爱吃杨梅的老友佐证:“诗成欲寄山中友,恐起头陀爱渴心”,意思是说,我本想把这首写杨梅的诗寄给在山里出家的诗友,但又怕他看到后只能望梅兴叹、狂吞口水,那就罪过匪浅了。杨梅更常见的是同荔枝作比较,宋代余鹄舒的《杨梅》诗中就提到:“若使大真知此味,荔支应不到长安。”诗中的“太真”是杨贵妃的号,这里化用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大意是说,如果当年杨贵妃要是尝到了杨梅的味道,那八百里加急送去长安的就不是荔枝而是杨梅了,借此来表明杨梅的色彩都比荔枝要好得多。杨梅的味道究竟如何?诗人文岳的两句诗应该是说到了点子上:“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成熟的杨梅果甘甜如蜜,但又不是单纯的甜,是那种蜜甜中透着一股子沁人心脾的酸,酸又反过来丰富了甜的丰富滋味。

那么杨梅又有哪些吃法呢?最简单、最直接的自然是摘下后用清水简单冲洗后食用,比如孟夫子就曾用自家产的杨梅来待客:“厨人具鸡黍,稚

子摘杨梅”,裴司士来访,孟浩然让厨子准备了香喷喷的黄粱米饭和炖鸡肉,还让小儿子现摘杨梅给客人佐酒,吃的就是一个新鲜。更讲究些的,是用杨梅蘸着吴盐吃,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李白途经梁园,当地的朋友设宴款待,其中就有“玉盘杨梅”——盘上先放置冰块,再码上洗净的杨梅,上面撒一层雪白的吴盐,吃的时候蘸着吴盐大嚼杨梅,别有一番滋味。据说这吴盐产自古淮江淮,味淡而鲜,是盐中的上品,杨梅渍盐或在盐水里浸泡一会儿,除却杀菌驱虫的功效,还能抑酸增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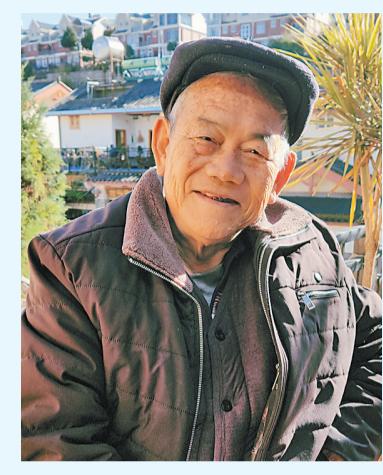
此外,杨梅还能做成粽子馅和杨梅烧酒。南朝诗人徐君茜曾写诗曰:“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这里的杨梅馅应该指的是杨梅干或杨梅果酱。同样,古人也曾尝试将新鲜杨梅浸泡在白酒里、加入冰糖调味再密封起来,做成色香味俱佳的杨梅烧酒,用于自饮或待客。汉代学者东方朔在《林邑记》中就记录了一款叫做“梅香酎”的杨梅烧酒:“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酿,号梅香酎。”据说“梅香酎”因为量少难得很是珍贵,只有家里来了贵客才会拿出来招待。如今南方的有些地区依旧保留了浸泡“杨梅烧酒”的风俗,酿成的美酒用来待客,以示敬重和亲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传承呢?

(作者系浙江省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字士风骨映百年
见贤思齐励今朝

王敬骝:新中国佤语文事业开拓者

王育珊



王敬骝(1935—2021年),浙江黄岩人,著名语言学家,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民族学报》副主编。王敬骝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工作者,也是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语言研究,是新中国佤语文事业的开拓者、新佤文的创制者,晚年提出“华夏语系说”,引起深远学术影响。

王敬骝自幼秉承家学精神,学习勤奋刻苦,文理兼优。1952年,年仅17岁的他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时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需要加强民族语文研究推广工作,王敬骝因品学兼优被调剂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经由刘春、费孝通等亲授民族工作、民族政策、民族概况等理论知识。他得知当时的佤族社会发展滞后,鲜有人研究佤语,毅然选择了佤语专业,从此结缘东方秘境深处的佤族人、佤文化。

1954年,王敬骝到阿佤山实习,实习期间独立完成当地各种重要会议的佤汉同声传译任务。毕业时为了参与国家为佤族人民创制佤文的调研工作,王敬骝放弃了留校回北京读博士研究生的机会,深入佤山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6年,他和同学们不负重托,在认真调查、比较、核实、反复商讨的基础上,提交了高质量的《卡瓦文字方案(草案)》。基于深入的调查工作和详细方案,1957年在昆明市召开了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正式通过了佤文方案(草案),创制了拉丁字母拼写的佤文字,佤族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字。

1959年,王敬骝深入阿佤山,全力倾注于佤文的推广。佤文推广初期,王敬骝不仅亲自编写《教学》《词语》等佤文教学大纲,还亲自撰写、刻印教材,手把手教佤族群众学习佤文。1979年,王敬骝调回昆明后,领衔创建了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佤语专业,还带领其夫人肖玉芬(佤族)着手《基础佤语》《佤语概论》《佤族文学》等佤语教材的编写和授课。王敬骝晚年组织编撰的《佤汉大词典》和《汉佤大词典》,堪称佤族研究的“百科全书”。

1959—1979年,王敬骝深入云南各地,充分利用云南语言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对南亚、藏、缅、侗台、苗瑶等相关语言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在思想上初步建立起汉语是混合语融合语的认知构想。1979年,王敬骝调回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着手相关论证。他撰写了《俅语调查报告》,参与了《德昂语简志》编撰,研究涉及各民族语言、文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项研究更是填补了南亚语系孟高棉语研究的诸多空白。之后《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等陆续见刊,相关论述蜚声学界。

1990年,王敬骝初次提出“汉语形成说”,基于多年深入研究,萌发汉语是由我国古代越、夷、羌及其他相关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接触融合而成的混合语的想法。2001年,在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王敬骝撰文《华夏语系说》正式提出“华夏语系说”。王敬骝取汉族之先民称“华夏”之由,借用当时语言谱系分类理论流行的“语系”一词将其思想概括为“华夏语系”,其思想实质是“汉语由多种语言融合而成”。该假设是王敬骝基于长期民族语文调查研究,结合扎实的汉语文基础,借鉴国内外语言研究方法,提出关于汉语和众多民族语言关系的一种讨论,也是关于汉语起源的一种讨论。2014年,在第47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王敬骝的主旨发言《探索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的新方法》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举例说明了“华夏语系”论说的可行性。

王敬骝以其独特的语言学视角提出了“华夏语系说”,成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在语言学方面的实证,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19年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40周年学术会议上,鉴于王敬骝先生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授予王敬骝先生“终身成就奖”。(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诗话杨梅

项伟

南方六月,红得发紫的杨梅又在水果店里占据了C位。杨梅,本土水果,原产于中国温带、亚热带湿润气候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关于杨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浙江余姚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在发掘该遗址时就发现杨梅属花粉,说明在7000多年前该地区就有杨梅生长了。

这种原产于江南的夏季佳果形似乒乓、色如丹顶,外表有箭簇状的颗粒,光是听到它的名字,绝大多数人便会口口生津。《世说新语·假谲》:“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望梅止渴”,古时杨梅常被与荔枝作比,宋代诗人董嗣杲在《杨梅坞》中就曾描述杨梅果子挂在枝头成球串的样子“累累疑与荔枝同”,比喻其果实成串似荔枝,同时期的诗人释祖可也有类似的比较,说它“色比江南荔枝深”,即杨梅的色泽比荔枝要深一些。事实上杨梅原本就是越成熟颜色越深,成熟后从鲜红到深红,有些品种的杨梅甚至会红得发紫、发黑。

若单以颜色而论,古人似乎更喜欢用“鹤顶红”一词来形容杨梅。所谓“鹤顶红”,指的就是丹顶鹤头顶的那一抹红色,因其鲜红耀目,故此得名。此类比拟的诗句有很多,如“摘来鹤顶珠犹湿,点出龙睛泪未乾”,以鹤顶、龙睛来比喻杨梅,一喻其色二喻其形;又如“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以鹤顶、猩血来形容杨梅色泽红艳,又以荔枝作比赞其味美。还有一种形象的叫法,把杨梅称作“火齐”,陆游在《采杨梅》诗中写道:“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深领得骊珠。”火齐,即火齐珠,据说是宝珠名,色红,相传出自骊龙的颌下;故用火齐和骊珠作比差不多是

